



1. 歷史前進需要大是大非
2. 高崗留下的困惑
3. 第三條道路去哪裡？
4. 發展壯大中產階級？



# 1. 歷史前進需要大是大非

黃仁宇的「大歷史觀」可能簡單：現代市場經濟需要數字化管理，中國傳統的道德統治不能適應社會進步的複雜性，需要艱鉅的徹底革命。國民黨完成上層建築的統一，共產黨完成社會基礎的再造。「這樣以商業體制作基礎的社會架構，符合凡事都能用數目字管理的條件，構成永久體制，才全面地促成中國的現代化。」<sup>1</sup> 這個公式化的歷史邏輯，貫串黃仁宇的大多著作。《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當然也不例外。<sup>2</sup>

黃仁宇是 1936 年的南開大學生，抗日戰爭擲筆從戎，成都中央軍校畢業；請纓上緬印前線，任新一軍上尉參謀；英勇負傷，獲海陸空軍一等獎章；<sup>3</sup> 後美國陸軍參謀大學，後「海歸」國防部參謀。大陸江山易主，黃仁宇流落海外，36 歲到美國密西根大學歷史系唸書，先大學生、後研究生、再 46 歲得博士學位。熱血青年，英勇戰鬥，事態炎涼，坎坷人生，黃仁宇的著作，不似一般洋博士「言必稱希臘」。「大歷史」的簡單框架下，更多知識分子對時事艱辛的體會，有滋有味。這樣學術模式的人生觀察，集中體現在《萬曆 15 年》。在這本《讀蔣介石日記》中，沒有多少日記，沒有什麼奇聞軼事，是黃仁宇參照自己在抗戰和抗戰勝利後的親自經歷，設身處地，對蔣介石百難之中為人處世，盡可能客觀的觀察。<sup>4</sup>

## ◎ 抗戰成就了蔣家王朝

說起國共之爭，國民黨落敗，常有人說共產黨是藉日本侵華坐大的。<sup>5</sup> 這種說法先是臺灣人說，隨著這些年臺資湧入大陸，如是說的大陸同胞，和著溫軟的臺灣國語逐次蔓延。倘若不是日本人打進來，共產黨那點兒土八路，早讓正牌國軍收拾乾淨了。<sup>6</sup> 黃仁宇透過《讀蔣介石日記》傳出消息，蔣家王朝正牌國軍也是藉助日本人打進來，才得以成就的。

1927年，蔣介石在黨外與共產黨翻臉，上海4·12大屠殺；在黨內與汪精衛翻臉，捕殺老友鄧寅達。<sup>7</sup> 1928年北伐勝利，全國統一，關鍵是年終張學良易幟，也是日本人深入中國鬧動亂直接促成。<sup>8</sup> 1929年初，桂系在南北抗命，馮玉祥與蔣介石反目成仇。1930年，蔣、桂、馮、閻中原大戰。生死相拚的全是國民黨黨員。蔣介石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兼第一集團軍司令，馮玉祥是第二集團軍司令，閻錫山是第三集團軍司令，李宗仁是第四集團軍司令。第二、三、四集團軍合夥，圍攻總司令，參戰部隊140多萬，「雙方死傷至少30萬人」。<sup>9</sup> 李宗仁回憶：「本為弔民伐罪的革命軍，轉瞬竟變成軍閥爭權奪利的工具。」<sup>10</sup> 馮玉祥炮轟蔣介石，一天時間發射炮彈兩萬餘發。**此項紀錄，日後八年抗戰都沒有打破！**<sup>11</sup>

蔣介石靠輕辭重幣，封官許願，拉攏對方部下叛變，才把這場大戰「擺平」。<sup>12</sup> 所謂「擺平」，對方的叛軍叛將，必須加官進爵，送槍發餉；戰敗的罪魁禍首，全是同志加兄弟，更得噓寒問暖，作手足情深狀。接著，1930年底，對共產黨蘇區第一次圍剿慘敗；1931年2月，又與黨內元老胡漢民鬧翻；5月，國府主席林森彈劾蔣介石；接著，對共產黨蘇區第二次圍剿失敗；9月，第三次圍剿失敗；接著，9·18事變，日軍佔領瀋陽，年底攻佔錦州，整個東北淪陷；12

月，國民黨四屆一中全會，蔣介石被迫辭職。1932年1月，淞滬戰役爆發，3月恢復蔣介石的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這以後，又有第四、第五次圍剿共產黨；蔣光鼐、蔡廷鍇的19路軍在福建成立反蔣政權；「長城抗戰」損兵折將，〈唐沽協定〉墨跡未乾，「河北自治」提上日程；1936年，陳濟棠、李宗仁兩廣事變，30萬大軍「抗日反蔣」誓師北上；……等等，等等。自從蔣介石登上歷史舞臺，內憂外患此起彼伏，沒等按下葫蘆，早已浮起了瓢，沒過上一天消停日子。雖然趁著追擊紅軍，中央軍深入到四川劉家、貴州王家、雲南龍家、青海馬家的地盤，也僅僅是深入而已。這些地方，一直到委員長逃離大陸，從來沒有完整屬於國府。

1975年4月5日蔣介石去世，《紐約時報》在4月7日的社論中，開宗明義地說：「蔣從未真正統治過中國」。蔣介石真正統治過的，只有臺灣。<sup>13</sup>

辛亥革命，大清朝皇帝遜位，中國上演「城頭變換大王旗」的鬧劇。軍閥土匪你來我往，分裂割據。表面上，國民黨領導的北伐重新統一了中國；實際上，各路諸侯擁兵自重愈演愈烈，中央政府照舊形同虛設。從北伐到1930年國民革命軍自相殘殺，軍閥越伐越多，全國軍隊從140萬增加到240萬。<sup>14</sup> 中原大戰的直接起因，是全國統一以後，中央政府提出裁軍。<sup>15</sup> 閻錫山公開叫板，說裁軍順理成章，但必須和蔣介石聯袂下野，共息仔肩，離職出洋。黃仁宇概括當時的情形：

中國舊社會既已崩潰，新社會尚未登場，如是只產生一批「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之人物，而外面又有強鄰壓境，蔣介石只有兩途鬥爭，又加著兩途遷就。<sup>16</sup>

各路諸侯、各派勢力各霸一方，「既不能令，又不受

命」，天下一統的中央正朔，倒成了勞碌受氣的小媳婦。媳婦想要儘快熬成婆，只好分頭遷就拉攏，結果必然藏污納垢。敵對的黨內同志，武的像李宗仁、白崇禧、馮玉祥、閻錫山，文的像汪精衛、胡漢民、林森、孫科，即便在戰場、官場，激烈鬥爭全贏了，也不能勝利——對方照樣保存實力，虛名實惠全得。給對方叛軍叛將封官發餉，以瓦解敵人的策略，也不可久用。粥少僧多，資源極度匱乏，用多了，勢必引起自家嫡系啾囂，鼓勵「殺人放火受招安」的昇官路線，早晚被對手學了去，反過來用在自己部下身上。

所以，蔣介石接手這個爛攤子，沒有能夠號令全國的大是大非抓在手裡。直到所謂「統一抗戰」時期，仍有東北軍、西北軍、桂系、粵系，山西之閻錫山，四川之劉湘、劉文輝、楊森，雲南之龍雲、盧漢等諸多兵種。至於說甘肅青海之五馬，新疆之盛世才，趁亂鬧獨立的達賴喇嘛，更是天高皇帝遠。「蔣介石其實所扮演的只不過是一種鬆散軍事同盟首要協調官。」<sup>17</sup>

外有日寇大兵壓境，內有軍閥分疆裂土，蔣介石把趙普的「攘外必先安內」，當成行動圭臬。<sup>18</sup> 從當時中日雙方實力對比衡量，把日本比作趙宋之契丹，或許有些眉目；孤立地說「安內」，恐怕一廂情願。單說國民黨內部，蔣介石與汪精衛、<sup>19</sup> 胡漢民、李宗仁、馮玉祥、閻錫山、國母宋慶齡、國子孫科等人的矛盾，從始至終沒有了結。<sup>20</sup> 實際上，當時的中央政府，重蹈崇禎、慈禧的覆轍，敗就敗在肘腋心腹的大判斷上。對外辱，「和平未到完全絕望之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決不輕言犧牲。」對內訌，統統「完全絕望之時期」，你死我活「最後關頭」。對不共戴天的共產黨，更是「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漏網一個！」這樣崇洋媚外，豈能不喪盡人心。

真正幫忙蔣介石的，是日本人不依不饒，硬塞過來一個足以號令全國的大是大非。有了全面抗戰，委員長才能大

唱高調，「地不分東南西北，人不分男女老幼」，既包括沒有地盤、沒有軍隊的汪精衛、胡漢民，也包括有地盤、有軍隊的李宗仁、閻錫山。幾大戰區一劃，德鄰金蘭背井離鄉，告別廣西老巢；臺兒莊戰役小勝，徐州會戰大敗，情願不情願，必須走程序寫檢查，發〈喪師失地請議處電〉。雖然「議處」仍舊是好言安撫，留有充分餘地，各路諸侯行文發電，向中央俯首稱臣，已是無可奈何的事情。除非像汪精衛那樣逃跑過去當漢奸。

壓倒一切的大是大非是，大敵當前，國運如絲，連共匪都統一抗戰了，中原大戰式的黨內鬥爭再沒有由頭，從此犯不上繼續優待政敵叛將。因作戰不力，殺馮玉祥叛將韓復榘，<sup>21</sup> 騰出的地盤和剩下的軍隊，滾滾而來的外部援助，敲骨吸髓的苛捐雜稅，都可以用抗戰的名義，堂而皇之培植嫡系。陳誠、杜聿明、廖耀湘、黃維、胡宗南、張靈甫等一批嫡系部隊應運而生，「校長門生」裝配精良。與此同時，調東北軍、西北軍到西北打共產黨；東北、內蒙、華北、華東、華中、華南，一路抗戰一路潰敗，損失、消耗、取消、重組的，盡是那些「既不能令又不受命」黨內派系和地方實力。

因蔣先生一心一意要藉對內對外的戰爭，把這些「雜牌」部隊消滅，所以平時扣發軍餉，戰時不予補充，待該部在戰爭中消滅殆盡時，中央便藉口將其番號取消。但是中央這種作風，各部隊長官皆洞若觀火，所以他們絕對不打硬仗，處處企圖保存實力，免被消滅。如此，自然無法表現其戰鬥力，同時軍紀亦易廢弛。於是，中央愈加蓄意加以消滅。演變的結果，中央當局便視「雜牌」部隊為癰疽，而「雜牌」部隊亦視最高統帥為仇讎，而形成一種互為因果的死結。<sup>22</sup>

沒過多久，「雜牌」部隊長官李宗仁的這套抱怨，連新來乍到的美國人也「洞若觀火」了：

事實上，因為日本人集中向華東進攻，蔣介石則把他的大本營安然撤到了西部的重慶和昆明，把作戰任務交給了各省和地方的軍隊，他拒絕調動任何他的國民黨嫡系軍隊上陣。<sup>23</sup>

如此這般，黃仁宇得出結論，蔣介石通過統一抗戰，完成了中國上層機構的統一。從這個意義上說，蔣介石應當感謝張學良——兵諫使汪精衛、何應欽等親日派、妥協派再沒話說，高擎統一抗戰的大纛，從此屬於蔣氏不容置疑的專利。西安事變，明明落入血海深仇的共匪手裡，居然能夠化險為夷，在抗日的題目下重返權力中心，由此可見大是大非扭轉乾坤的力量。當然，暫時停止剿共，蔣介石並不情願。但是，客觀地看，當時脫穎而出的蔣家王朝，在群雄逐鹿的角鬥場上，不僅有共產黨的威脅，中原大戰和蔣介石再次下野足以證明，更多、更直接、更強大的挑戰，持續來自各派各地當官領餉不受命的黨內派系和地方實力。東北張學良、西北馮玉祥、山西閻錫山以及桂系李、白，論實力，哪個都比東躲西藏的共產黨強大。從黨內政治鬥爭到軍事上大打出手，哪個都比赤手空拳鑽山溝的紅軍，對蔣氏的統治地位威脅更直接、更嚴重。<sup>24</sup> 這時候，只有全面抗日必須統一號令，兵諫把蔣介石強力推薦成全中國名正言順的最高統帥。「事變之後，蔣在國內聲望之隆、盛德之高，真是史所寡有。」所以，蔣介石不殺張學良，應當不單單出於拜把子的兄弟私情了。<sup>25</sup>



## ◎ 「不畏鯨吞，而怕蠶食」<sup>26</sup>

一盤散沙，軍閥混戰。不畏鯨吞，而怕蠶食。

以「七七事變」為例，馮玉祥舊部宋哲元，從始至終財政獨立，「不盡受中央節制」。1935年底，「華北自治運動」的結果，「中國認冀察政務委員會係中央設置的地方機構，日本視之為華北自治性質機構」。<sup>27</sup> 盧溝橋事件發生，中央軍增援早到保定、滄州。一直挨到1937年7月24日，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宋哲元，寫給總司令的信仍然是，「刻下擬請鈞座千忍萬忍，暫時委屈求全，將北上各部隊稍為後退，以便緩和目前，俾得完成準備。」三天之後，局勢完全不可收拾，宋哲元才急忙電請中央軍「星夜兼程北進」。接著，日軍相繼佔領北京、天津。<sup>28</sup>

中國一盤散沙，又碩大無朋。列強把沿海「肥肉」零敲碎打，利益均沾，爭先恐後。然而，誰想來個大包圓兒，拿整個中國囫圇吞棗，注定消化不良。蔣介石喫透了這一點，施老佛爺賠款、割地、西狩之故技，用空間換時間，眼看著東北、華北、內蒙、華東、華中、華南相繼淪陷，咬緊牙關硬是不投降。只要重慶政府堅持抗戰，溥儀、王克敏、汪精衛等漢奸政權，再多也沒有合法性，不甘心日本獨霸中國的列強，自然會繼續跟蔣家王朝打交道。

## ◎ 「四強之一」的負擔<sup>29</sup>

果然，「挺」字經終於唸來世界大戰蔓延全球。羅斯福為了讓中國在東亞牽制日本，劃分「中緬印戰區」，擢拔蔣介石當中國戰區總司令，賜封中國為世界「四強之一」，與美、英、蘇齊頭並進，共同創建聯合國！<sup>30</sup>

中國近代以來，兩次鴉片戰爭，一次甲午海戰，八國

聯軍進北京，火燒圓明園，兩代皇帝落荒而逃，割地賠款家常便飯，一直鬧到倭寇霸佔泰半河山，滿州國、華北臨時、華中維新、南京國民，一個接一個偽政權，五顏六色旌旗招展。<sup>31</sup> 老大帝國受盡屈辱，淪落成任人宰割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墮入亡國滅種的絕境。忽然，因為苟延殘喘的重慶政府堅持不投降，國際交往中，破天荒，享受起種種頭等大國的外交禮遇。開羅會議，蔣介石戎裝素裹，欣欣然，儼儼然，與羅斯福、邱吉爾起居往來，平起平坐，結成反法西斯同盟，討論全球勢力瓜分，承諾戰後收復臺灣澎湖列島，取消租界和治外法權，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sup>32</sup> 這份豐功偉績，這等國際地位，空前絕後。到今天，都是海峽兩岸領導人可望而不可及呢。一時間，蔣委員長的威望如日中天，「一個信仰，一個政府，一個領袖」的呼聲甚囂塵上。在社會輿論中，蔣中正驟然成為比曾滌生還了不起的民族大英雄——曾、李、彭、胡不過「同治中興」而已，哪裡有「四強之一」揚眉吐氣？喜出望外的蔣介石，雖然在日記裡豐次以「豈不惶懼」的辭句警戒自己，<sup>33</sup> 一面又情不自禁「作中流之砥柱，挽狂瀾於既倒」，<sup>34</sup> 「以亞洲最大國的領袖地位」，先後出訪印度、緬甸，調和當地民族主義對英法殖民的深仇大恨，共同抗日，統一指揮，並且高瞻遠矚大中華在亞洲的戰後外交格局了。<sup>35</sup>

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評估「四強之一」：

中國人民歡迎許多外國政府宣佈廢除對於中國的不平等條約，並和中國訂立平等新約的措施。但是，我們認為平等條約的訂立，並不就表示中國在實際上已經取得真正的平等地位。這種實際上的真正的平等地位，決不能單靠外國政府的給予，主要的應靠中國人民自己努力爭取，而努力之道就是把中國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建設成為一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否則便只會有形式上

的獨立、平等，在實際上是不會有的。就是說，依據國民黨政府的現行政策，決不會使中國獲得真正的獨立和平等。<sup>36</sup>

丘吉爾在不同場合，逮著機會就反對「四強之一」：

把中國說成同英國、美國或蘇聯同等的世界大國是完全不真實的，所以，我不同意這樣聲明。<sup>37</sup>

把中國當作世界四強之一，這是一個絕對的笑話。<sup>38</sup>

說中國將在歐洲事務中擁有「超出禮節性之外的」發言權，抑或說，為著歐洲的利益，中國的重要性將超過法國或波蘭，或者將取代奧匈帝國的任何一個國家，甚至哪怕是超過最小的，但古老而又歷史悠久的盟國，如荷蘭、比利時、希臘、南斯拉夫等——這種說法根本不屑一顧。<sup>39</sup>

美國歷史學家考證，「羅斯福同任何其他獲悉中國現實情況的人們一樣，深知中國那時並不是一個世界大國，而且在戰後一個長時期內，也還不可能是。……他深知蔣的政權貪污和殘暴，中國軍隊極需改組」。<sup>40</sup> 蔣介石的看法截然不同，公開場合臉腫人胖，「獨立的中國同英國和美國平起平坐了。」<sup>41</sup> 1943年3月，用廢除不平等條約說事，展開出版《中國之命運》，概括得鏗鏘有力，總結得擲地有聲！

中國國民黨革命如能成功，則中國國家方能獨立。如果今日的中國，沒有了中國國民黨，那就沒有了中國。簡單的說，中國的命運，完全寄託於中國國民黨。如果中國國民黨的革命，今日不幸而失敗了，那中國的國家亦就無所寄託，不僅不能列在世界上四強之一，而且就要受世界各國的處分。<sup>42</sup>

兩個月以後，共產國際解散。蔣介石按捺不住急迫，企圖閃擊延安，以軍事手段消滅毛澤東。<sup>43</sup>

1943年1月11日，根據平等原則簽訂了一項新的中美條約。但不到五個月又簽訂了另一協定，使在華美軍（到1945年達六萬人）可以不受中國刑法的約束。美軍基地、補給和運輸部門、無線電通訊網、航空系統和陸軍郵局不久就在中國土地上開始工作，其規模之大和獨斷橫行的程度是西南地區即使不平等條約時代也從未見過。<sup>44</sup>

不知讓人說什麼好的是，隨著美援滾滾而來，蔣介石補苴罅漏、東拼西湊的統一政權，不得不與國際接軌了，從此一發而不可收拾。派系傾軋腐敗顛預的政府，被先進生產力的美國人按照世界四強的標準，橫挑鼻子豎挑眼，哪兒哪兒全成了不是。從史迪威到馬歇爾，蔣介石整個下半輩子，生活在希望被美國人理解、體諒，與美國人沒完沒了的誤解和解釋之中。

本來，蔣介石很早皈依了基督教，禱告禮拜鄭重其事。<sup>45</sup> 學著曾國藩的樣，正襟危坐，一絲不苟，天天寫日記，警心滌慮。修身養性，煙酒不沾。「新生活運動」，單飲白開水，連茶葉都省了。美麗尖長大受教育的美麗太太，自詡「我唯一跟東方沾上邊的就是我的面孔。」小舅子宋子文，禮聘「海歸」財政部長、外交部長、行政院長，甚至連中文公文，要翻譯成英文，才能看明白。<sup>46</sup> 蔣家王朝西化、美化，身體力行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

誰知種種誠懇全然無效。既然是「一個領袖」，就得對所有雜魚爛蝦部下，種種拆爛污的醜陋行徑，負全部責任。甚至自己不畏艱險勞頓，頻頻坐飛機親臨前線，到各戰區耳提面命，鼓舞士氣，在美國人眼裡，也成了戰爭失敗的根本

原因。真正是費力不討好。<sup>47</sup>

按照黃仁宇的說法，當時重慶政權偏安一隅，腐敗黑暗，實在夠不上「四強之一」。羅斯福恩賜的光榮稱號，雖然鼓舞士氣，卻為世人衡量中國政府，提供了一個蔣家王朝根本做不到的高標準。文官三隻手，武將四條腿，怎麼量怎麼不對。「前方喫緊，後方緊喫」，舉世聞名。「抗戰後期，美國有關官員曾公開說：中國人何必到處求外國借款，動用部分中國人在美國的存款就可以解決中國的財政困難了。」<sup>48</sup>「多年後杜魯門指控蔣宋夫婦和孔宋家族從美國援華的350億美元中『竊取』了7.5億美元，並稱他們『都是盜賊』」。<sup>49</sup>

蔣介石好不容易當上空前絕後的民族英雄，不能改口說自己不夠資格，只好東拉西扯各種理由搪塞，希望美國人體諒中國的特殊國情，反而使天真率直的美國人，越發認為蔣介石言不由衷，不真誠。1943年日本發動「一號作戰」，得到大量美援的「四強之一」，洛陽、衡陽兩路潰散逃亡。美帝國主義跌破眼鏡，居然得出結論：「**蔣介石的戰略是不進行抗日**」。<sup>50</sup>

中美合作與日美合作很大不同。日美合作，壓根兒沒有共同語言和相互信任，結合的基礎是實力較量與利益權衡。<sup>51</sup>日語與英語語法不同，句子比中英文長得多，而且放謂語在句子最後。外交辭令的時候，主語跟上一大堆形容詞，可以一面說一面察言觀色。一旦神色不對，最後還可以臨時改口。譬如，「你的混帳的臭狗屎的狗娘養的王八操的王八蛋的——不是」。中文語法與英語一樣，主謂賓狀排列有序，話一出口，好話壞話就是它了。「你是——」，後面說出什麼就是什麼，再想改口，只有進一步解釋，來不得日語的隨機應變。或許因為這個原因，中國人與美國人打交道，一上手，時常產生相見恨晚的錯覺。蔣介石對栽培他當「四強之一」的羅斯福，始終存有他鄉遇故知的幻想。<sup>52</sup>

言語只是溝通的工具，更要命的是思想方法的差異。曾國藩辦外交，講究一個「誠」字。但中國人的誠，不完全是誠實的誠，而是誠懇的誠，強調的是將心比心。換言之，是相互留面子，迂迴曲折之誠。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家家有本難唸的經，允許有難言之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說話辦事，點到為止，是慈悲為懷的德行。於是，中國人辦外交，與辦內務一樣，講究的是關係——不僅替自己考慮，而且要考慮別人。美國人的誠，更多是誠實的誠。市場經濟商品交易，謀私利是天經地義。既然「人人為自己，上帝為大家」，則應當有什麼說什麼，直來直去。發你一頂「四強之一」的高帽，外加諸多物質援助，當然是要你在全球一體化的世界大戰格局考慮問題，出兵緬甸、印度，從側翼支持英美的南太平洋諸島戰役。

中國失去了秦半河山無從收復，憑什麼給英美當炮灰，出國作戰為哪般？總司令只是在雲南受到威脅，擔心日本人抄了重慶後路的情形下，考慮「中緬印戰區」的戰役佈置，主要精力繼續放在國內的各派勢力紛爭和剿共。如果實話實說，「攘外必先安內」，等於承認自己還不完全是統一中國的唯一領袖，那麻煩可就大了。史迪威始終牢牢把握美援物資發放，一直有一派謝偉思式的「中國通」，反復要求援助其他抗日武裝，特別是深入敵後的共產黨。這番婉轉苦衷，遇到通情達理的中國人，不難心領神會。對美國人不能明言。於是，蔣介石只好一味強調大道理，中國軍隊尚未強大到出國馳騁的水平，因此需要更多美援。

不曾想，順著蔣介石解釋的邏輯，直腸子的史迪威發現，中國百姓聽話善良，中國士兵喫苦耐勞，中國軍隊疲軟的原因，是上層烏煙瘴氣。<sup>53</sup> 不改變結黨營私貪污腐敗，美援再多也沒用。史迪威越多深入中國實際，越是站在中國的角度看問題，越不能接受蔣介石的解釋，進而依仗發放美援的權力，當真反復要求，把中國軍隊交他訓練指揮，以便

超脫錯綜複雜的派系和人事關係，選賢任能，與國際慣例接軌。<sup>54</sup> 於是乎越解釋越擰。明明是中國人內部貌合神離，如何凝聚統一的題目，到美國人那裡，變成了怎樣有效改革軍隊，改革政府。這樣主題錯位的假戲真唱，爭論和解釋沒完沒了，不僅充滿了抗戰的全過程，而且延續到史迪威以後，與整個美援的歷史相始終。<sup>55</sup> 費正清的總結是：

從我們戰時的同盟關係開始起，美國軍官就發現自己與之打交道的對方是個無能的政府，它被國內問題弄得虛弱不堪，以致不能對外界的刺激作出反應。我們為了竭力幫助它，同它的衰亡和沒落糾纏在一起而不能自拔。<sup>56</sup>

羅斯福曾經關心從中國大陸進攻日本，所以支持史迪威改革、訓練中國軍隊，甚至措辭強硬地正式要求蔣介石，把中國軍隊的指揮權轉交史迪威。<sup>57</sup> 國軍洛陽、衡陽兩路潰敗之後，美軍太平洋跳島戰術成功，華府放棄了從大陸進攻日本的設想，懇請蘇聯出兵幫忙，撤回統兵戰將史迪威。<sup>58</sup> 二戰結束，冷戰開始，美國從抑制蘇聯的角度，全力以赴支持蔣介石。美國越是支持蔣介石，越是殷切期待中國政府和軍隊走出腐敗，美國朝野越發施加強大壓力，要求蔣介石徹底改革。

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當時蘇聯體制與英美完全不同，為什麼沒有人纏著斯大林改革開放，在體制上與國際接軌？答案是明擺著的。蘇聯強大，接軌不接軌，都是超級大國。中國積弱，越是誠懇表達改革接軌的願望，越是被美國人牽著鼻子走。說到底，還是為揠苗助長、名不副實的「四強之一」所累。毛澤東說得多好！「世界上只有貓和貓做朋友的事，沒有貓和老鼠做朋友的事。」<sup>59</sup> 明明不夠強壯，上桿子湊上去逞強，不僅做不成朋友，反而落個渾身不是，自討沒

趣。

費正清對「四強之一」的鬧劇總結得到位。

這種把大國地位給予國民黨政府的舉動是美國完成的，並非中國、更絕非英國或蘇聯的成就。這在當時被認為是對一個值得欽佩的偉大民族做出的一種漂亮的友好表示。但歷史可能要以幻滅的眼光來看待那種舉動，把它當做太平洋彼岸策劃製造中國歷史的一種並不能夠解決實際問題的努力，也就是想從國外以言辭來加強一個業已在本國趨於沒落的政權。<sup>60</sup>

## ◎ 抗戰勝利的失落

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南京政府是中華五千年歷史上最富裕的一個中央政府。庫存黃金白銀美鈔的價值，史所未有也。加以美式配備的四百萬大軍；飛機千架，艦艇如雲。原是聯合國中，不折不扣的四強之一。為什麼為時不過三年，竟被一批土共的「烏槍、鐵錘、土炮……」（抗戰歌詞），打得落花流水？！<sup>61</sup>

日本投降，抗戰勝利，舉國歡騰，蔣介石的實力和威望上昇到頂點。這是他決心用六個月時間，徹底消滅共產黨的決策依據。黃仁宇和絕大多數人，包括毛澤東都沒有想到，短短三年時間內戰，國民黨政權壽終正寢。<sup>62</sup> 根本原因是日本投降了，統一抗日的大是大非結束了，「一個信仰、一個政府、一個領袖」的基礎土崩瓦解，蔣家王朝房倒屋塌。

國際方面，雅爾塔會議，倆大鼻子、一老毛子，三強不招呼四弟，拿戰後的亞洲利益重新瓜分，不僅包括日本，還包括中國的東北、膠東和新疆，而且把分裂出去的外蒙古獨立，再次肯定下來。<sup>63</sup> 事前不徵求意見，事後不讓知道。凡



此種種，全然沒有繼續把中國、把蔣介石當成「四強之一」禮遇的情趣了。

國內方面，抗戰勝利了，社會黨派、地方勢力、國民黨內部派系，因為統一抗日而暫時妥協的基礎不復存在。東拼西湊的統一政權，還原成泥足鉅人。這時候，蔣介石憑藉「合法政府國家軍隊」的書本道理，決心用抗戰積累的美援實力消滅共產黨，難有勝算。更何況，共產黨提出「建設和平民主新中國」的口號，順天應人，抓住了當時渴望和平、厭惡專制的民心。

沒有大是大非，只能七拼八湊。好像一家公司沒有主業，為了賺錢，什麼生意都做，有什麼生意做什麼生意。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沒有錯。問題是用什麼標準去團結？統統團結過來幹什麼？首先，什麼力量需要著重團結不清楚，自然無法識別什麼樣的人才需要刻意籠絡，什麼樣的實力本該淘汰。結果自然是誰有實力團結誰。接著，有實力的人憑什麼服你？結果自然是以人劃線，培養自家嫡系。一旦有了嫡系雜牌之分，結果自然是派系錯綜複雜，心懷異志、首鼠兩端者防不勝防。蔣家王朝軍興以來，從北伐到內戰，少數嫡系死打硬拼，地方雜牌保存實力，或畏葸不前，或望風披靡，幾乎成為常規定式。接著，離心強化猜忌，猜忌強化離心，結果自然是越發任人唯親。蔣介石軍事上大權獨攬，空軍攥在太太手裡，財政、金融、外交、行政，孔祥熙、宋子文郎舅倆輪流作莊，欺行霸市，中飽私囊，而且相互扞格不入，乃至公開攻訐構陷。「蔣家天下陳家黨，宋氏兄妹孔家財」。家事、國事、天下事攬和成一團，公事變私情，民怨沸騰了。<sup>64</sup>

蔣介石一身兼著軍官學校校長，步兵學校校長，炮兵學校校長，交輜學校校長，工兵學校校長，騎兵學校校長，航空學校校長，陸軍大學校長，軍醫學校校長，

中央政治學校校長，又曾任過一度中央大學的校長，還有許多軍官分校也是蔣介石當校長，只有一個獸醫學校校長不兼。大概算起來，蔣兼了37個校長，教育長都當不了家，事情怎麼不壞？軍紀怎麼不壞？

這幾年蔣介石當政以來，用人的辦法，第一是他的本家，如蔣孝先一類的人；第二是他的親戚如孔、宋、毛一類的人；第三是用他的鄉親，就那多得很了；第四，用他的故舊，如二陳派。用人不問他賢與不賢，先問他故與不故，不問他能與不能，先問他親與不親。這種用人方法，哪裡去找內行呢？真能做事的人，誰又肯跟他來作呢？<sup>65</sup>

這樣不講主業只問實力的大公司，表面上龐然大物，碰上有主業的競爭對手，不可一世變成不堪一擊，辛辛苦苦拉攏過來各種實力，紛紛被對手重新團結整編過去，到頭來「為他人做嫁衣裳」。三年內戰期間，國民黨軍隊陣前倒戈，起義的起義，投誠的投誠。國民黨內部，上下樞密機關，共產黨地下黨無孔不入，無處不在。

1938年韓復榘被處決之後，他的衛隊旅長吳化文忽率部投敵。吳旅為韓部配備最佳的一旅，後受北平偽組織收編為偽軍。抗戰勝利後，吳部向中央投降，為山東省省主席王耀武所收容，駐於兗州。後吳部為共軍所圍，苦守數月，迭向王耀武乞援，無奈王氏又實行中央借刀殺人的故伎，不予援助，吳化文憤而投共。嗣後，吳化文竟為共軍的先遣部隊，進入南京。<sup>66</sup>

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最後一次國共談判了。國民黨談判目的是劃江而治，長江天險、上海南京、大西南、大西北還在手上，頗有討價還價的本錢。共產黨不買帳，談判最終

破裂，以張治中為首的談判代表團，整個留北京不回來了。<sup>67</sup>就個人關係而言，蔣介石待張治中不薄，而且有年頭了。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委員長大勢去矣，識時務者為俊傑。動蕩時期有志之士，以救亡圖存、解民倒懸，為建功立業的大原則。雖然也有陳布雷這樣「士為知己者死」的榜樣，<sup>68</sup>匡世濟民畢竟是士大夫追求的根本。小道理服從大道理，個人感情再深，擋不住大是大非的抉擇。

平心而論，委員長接手軍閥割據的爛攤子，以黃埔北伐軍為嫡系，依據現有實力招降納叛，是實現大一統的簡便途徑。但是，不講原則是非只講個人效忠的組合集團，公事化私情，藏污納垢孳生腐敗，模糊選賢任能的標準，排斥經邦治國的人才，形成惡性循環：大量志士仁人參加共產黨，共產黨興旺發達→外部壓力越大→內部派系利益衝突的協調成本越高→越必須團結、穩定、遷就、妥協→腐敗越嚴重→越留不住人才→共產黨越強大……。

蔣介石戎馬一生，北伐半路寧漢分裂，被迫下臺；接著中原大戰，明明戰爭得手，被戰敗的黨內同志趕下臺；接著「雙12事變」，自己的副總司令把拜把子大哥兩肋插刀抓起來，在楊玉環女士洗澡處，留下一個「捉蔣亭」的旅遊景點；接著本黨副主席從重慶潛逃降日，回首都組建漢奸政府，率領幾十萬偽軍與國軍糾纏；最後好不容易熬到第二次世界大戰輝煌勝利，在外被共產黨打得一敗塗地，在內被桂系宿敵再次轟下臺。從一統天下的雄心壯志出發，學著曾國藩忍辱負重，喝白開水日理萬機，寫日記鳴冤叫屈，打碎牙和血吞，艱苦奮鬥成眾叛親離。亞洲四小龍尚未啟程，李宗仁匆忙給大哥蓋棺論定了：

「蔣介石」三個字，成為中國政府貪污、無能、獨裁、專制的代名詞。蔣介石政權早為中國人民所唾棄。<sup>69</sup>

## ◎ 黃仁宇的沉思

1949年1月21日，內戰失利，黨內紛爭，迫使蔣介石第三次下臺。「引退」第二天，蔣介石在日記中總結：

此次失敗之最大原因，乃在於新制度未能成熟與確立，而舊制度已放棄崩潰。在此新舊交接緊要危急之刻，而所恃以建國救民之基本條件完全失去，焉能不為之失敗！<sup>70</sup>

根據黃仁宇的模式，「新制度」是從中國傳統道德治國，到現代化數字化管理。國民黨完成社會上層結構重組，共產黨完成社會基礎再造，都是在為商品社會奠定框架。黃仁宇充分肯定，土地革命是共產黨戰勝國民黨的根本原因。循著「大歷史」的邏輯，黃仁宇把共產黨的土改，與蔣介石逃到臺灣以後的土改相提並論；把大陸的改革開放，與臺灣經濟起飛的奇蹟等量齊觀。——「今日大陸雖仍稱共產，實在有『金蟬脫殼』之姿態。」<sup>71</sup>於是乎，共產黨、國民黨之間的主義之爭，成為歷史遺蹟，如今剩下的只有統獨之爭了。<sup>72</sup>為此，黃仁宇對中華民族向現代化邁進，充滿樂觀情緒。

然而，黃仁宇的整本《讀蔣介石日記》，卻讓人產生另外的疑惑：既然這個「新制度」是國共兩黨的共同目標，為什麼「新制度未能成熟與確立，而舊制度已放棄崩潰」？為什麼這個「新制度」不能直接用來號令天下，非得東拼西湊藏污納垢？像到臺灣一樣，國民黨北伐勝利，或者一邊北伐一邊實施全面土改，如今豈不連統獨之爭都沒有了？

黃仁宇迴避不開這樣的提問。

為什麼蔣介石不改革農村，爭取群眾？……今日如果再提出以上問題，倒不如說：「為什麼蔣介石不做毛

澤東？」我們也可以說縱是蔣願意做此事，則中國還要另外尋覓一個蔣介石，去對付當前的大敵獲得國際的支援。……所以即使沒有思想上的衝突，從技術上講，製造一種高層機構與翻轉底層機構已只能各立陣營，分道揚鑣。

臺灣土改不需要「去對付當前的大敵獲得國際的支援」？實際上，「大歷史」容納不下這樣尖刻的問題。只好說，「今日有人再提出此種問題，則可以謂之為冥昧無知。」<sup>73</sup> 關於推行土改的難處，蔣經國肯定比黃仁宇體會得更多。江南用生命換來的總結，懇切到位：

一旦動搖到國民黨的根本，注定非敗陣不可。以他公佈的〈新贛南土地政策〉為例，規定土地分配依人口而決定，超額由中國農民銀行照價收買，再轉貸佃農，地價由人民開會來決定，分五年還清，是一種溫和的土改政策。聽起來，好像很動人。後來，陳誠在臺灣實施，就非常成功。

但是，當時的社會環境經濟條件，他辦得到嗎？壟斷土地的土豪劣紳，封建保守，要改革，只有斯大林的辦法才能徹底施行。使大地主破產，國民黨的根基，即會動搖，而由「銀行照價收買」，銀行固沒有這樣大的財力，地主怎肯把土地換成銀錢，少了可作威作福的屏障。<sup>74</sup>

是共產黨矢志不移，百折不撓，堅決打擊封建保守、壟斷土地的土豪劣紳，堅決動搖國民黨的根基。「農村包圍城市」的最終勝利，說白了，誰有本事實現「耕者有其田」，誰才有資格建立新中國。其實，明眼人不難看出，抗戰勝利之後，歷史前進新的大是大非，是社會主義運動在全球範圍蓬勃興起。<sup>75</sup> 國共兩黨之爭，為什麼「翻轉底層機構」的共

產黨一定打敗「製造高層機構」的國民黨？黃仁宇過從甚密的李約瑟看得一清二楚。「中國之走上社會主義之道路無非想避免歐洲工業化過程中所犯的錯誤，於是極表同情」。<sup>76</sup>甚至蔣介石的拜把子兄弟、參與發動4·12屠殺共產黨、一輩子「製造高層機構」的《李宗仁回憶錄》，最後結論是：

就近代歷史的發展趨勢看，資本主義及其與之俱來的殖民主義經數百年的演變，今已日趨沒落。因資本主義制度對內每易發生無法解決的階級問題，對外則難免趨向擴張主義。時至今日，由於此兩項問題的無法解決，資本主義已至日暮途窮之境。……我國先賢於兩千餘年前即有「大同」理想。今後世界政體演變的終點，我亦將視其為國界消滅、種族平等的民主社會主義的世界聯邦。<sup>77</sup>

國民黨嫡系的強大軍事實力，經過八年抗日的實戰考驗，又是合法政府的國家軍隊，又是美式裝備、美軍訓練、美軍飛機炮艦齊上手幫忙，背後還有原子彈撐腰，短短三年功夫，讓山溝裡衝出來的土八路秋風掃落葉了。「共軍反守為攻，國軍精銳，像見到太陽的堅冰，快速融化。」<sup>78</sup> 1945年以後三年時間，美國運給蔣介石各類戰略物資43.5億美元。<sup>79</sup>「艾奇遜的信上說，美國對國民黨政府的物質幫助佔國民黨政府的貨幣支出的50%以上」。<sup>80</sup> 現代化進程不可或缺的國際支援，統統變成「運輸大隊長」奉獻「共匪」的戰爭繳獲。「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窮原竟委，委員長深陷政治腐敗、軍事無能的滅頂泥淖，折衝樽俎，虛與委蛇，明明民不聊生，強推「新生活運動」，找大鼻子上帝早請示晚彙報，繪成一幅「諷刺與幽默」的漫畫，哪裡可以與「社會主義新中國」這樣的大是大非爭鋒？黃仁宇自己都說：

在20世紀末葉，社會主義已是任何的開明之資本

主義的體系所必須。今日去《共產黨宣言》已150年，資本主義能夠依然存在，主要由於它能糾正自己的錯誤，補救本身缺陷。比如說，《共產黨宣言》裡面所主張的廢止童工、施行累進稅制、提倡義務教育及由政府管制信用等等，在當時看來都有社會主義性格的措施，今日已為資本主義體制內之家常便飯。美國可算是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國家，它預算內最大的支出項目則為社會福利性質的開銷。<sup>81</sup>

「資本主義最發達的」美國尚且不得不如此，既不能糾正錯誤，又不能補救缺陷的蔣家王朝，憑什麼可以倒行逆施，硬要在中國落實一個比西方更野蠻、更殘酷的資本主義呢？

況且，她的個人舉止「並不能說明一位正在引導她的國家走向民主未來的領袖」。當約翰·L. 劉易斯威脅要進行煤礦工人罷工時，羅斯福在一次宴會上問蔣夫人，中國在戰時會如何對付這樣的勞工領袖。她表情豐富地伸出一個手指在脖子上一劃，總統笑著招呼埃莉諾說，「妳看見這個手勢嗎？」後來，他私下問他的夫人，「噯，妳覺得妳的那位溫柔甜蜜的人怎麼樣？」因為她曾經說蔣夫人「嬌小溫柔」。

與其說她是一個民主政權的第一夫人，不如說她是一個帝國的女王。……為了抵制她爭取更多的援助的壓力，總統指示要同她疏遠，而且很快向摩根索明說，他「切望她離開美國」。<sup>82</sup>

要不是藉助韓戰、越戰、冷戰，兩大陣營在亞洲對壘，沒有美國捨命相救，國民黨連臺灣都保不住，遑論什麼土地改革、經濟奇蹟、民主進程？直到40年時間過去，東歐倒戈，蘇聯解體，大陸改革，這才輪得上到《歷史的終結》，

討論國共兩黨「數字化管理」的殊途同歸。<sup>83</sup> 回顧歷史，蔣介石用黑社會殺共產黨，急於藉助黃埔嫡系和西方列強一統天下，丟掉的是孫中山「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的三民主義。倘若孫中山沒有英年早逝，把聯蘇、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貫徹始終，拿民生主義昇華到社會主義，那歷史才真有可能不知道怎麼寫呢。<sup>84</sup>

在此黨內糾紛無法解決之際，參加黨爭的人，大半只顧目的，不擇手段。流風所及，國民道德、社會風氣均蒙受極不良的影響。其中最顯著的一個例子，便是上海流氓社會地位的提高，終至與黨國要人相頡頏。<sup>85</sup>

1949年夏天，在杜魯門總統要求下，國務卿艾奇遜搜集了所有關於中國抗戰時期與內戰過程的經驗以及美國涉入的相關文件，然後在一封電文中提及：「國民政府的軍隊不一定會被擊敗；他們是自我瓦解的。歷史在證明沒有信仰的政權，沒有士氣的軍隊，是經不起戰場的考驗。」<sup>86</sup>

如今，美帝國主義主導的全球一體化，似乎又把中國推進一個沒有信仰、是非不清的年代。思想解放，唯利是圖。大鳴大放的大道理說不清了，沒人信了，塵封檔案解密，名人回憶曝光，用「鮮為人知」的捕風捉影發現歷史，揣測歷史，重新成為時代潮流。即便如此，幾乎所有小是小非的總結，無不透露大是大非的背景力量！譬如，江南評價蔣介石、毛澤東，中而懇之：

蔣先生在某一方面是個強者，遇到乾坤一擲的大事，他那畏首畏尾的懦弱性格，即表現無遺！因此換來「獨裁無膽，民主無量」的譏諷。他的格局，遠遜毛澤東，類似袁世凱，擅長小動作小權術，缺少衝天一擊的大智慧大氣魄。<sup>87</sup>



一個時勢造英雄，一個英雄造時勢。蔣介石堪稱亂世之奸雄，毛澤東才是把握歷史命運的大英雄。主業不明的公司，規模一時擴張得再大，GDP 持續高速增長得再多，不過一時找不著北的沒頭蒼蠅。鑒往知來，只要真的《歷史沒有句號》，泥沙俱下的歷史長河中，一定有新的大是大非。<sup>88</sup> 只有洞察和把握歷史前進的大是大非，才能駕馭時代潮流的驚濤駭浪，滌蕩污泥濁水，推動社會進步，成為真正的勝利者。

## 註釋和出處：

- <sup>1</sup> 有「大歷史」的框架籠罩，國共兩黨幾十年殺得血流成河，都是分工合作一個「永久體制」，只不過當事人缺乏今天這樣的歷史縱深，蒙在鼓裡不知道。黃仁宇原話：「可是蔣先生與毛先生活動於本世紀的前半期，他們彼此的事業都已在世紀的中期達到最高峰。他們和歷史過於接近，沒有我們看得真切。而尤其他們沒有看及身後又一、二十年多餘的縱深，所以他們在歷史上所發生的作用，只有我們後人才可以綜合判斷」（黃仁宇：《大歷史不會萎縮》第 129、138 頁）。
- <sup>2</sup> 黃仁宇說：「我近年所著書即強調國民黨與蔣介石因著北伐與抗戰替新中國創造出來一個高層機構。中共及毛澤東因著土地革命翻轉了低層機構，今後中國之當務之急為敷設上下間法制性的聯繫」（黃仁宇：《近代中國的出路》第 151 頁）。黃仁宇對蔣介石的具體評述，另見《大歷史不會萎縮》第三、四、五、11、12 段，《放寬歷史的視界》中〈蔣介石的歷史地位〉（第 231~280 頁），《中國大歷史》第 20 章，《近代中國的出路》，《地北天南敘古今》中〈蔣介石〉以及〈張學良、孫立文和大歷史〉（第 285~293 頁），《資本主義與 21 世紀》第 7~8 章。
- <sup>3</sup> 有關滇緬叢林的戰時經歷，詳見黃仁宇：《地北天南敘古今》，《黃河青山》。
- <sup>4</sup> 黃仁宇的父親黃震白，是晚清同盟會會員。黃仁宇說父親為他起

名「仁宇」，應在了著書立說時宅心寬恕，以推己及人之心評述歷史。

- 5 蔣介石的說法是，當安內工作「正在順利進行的時候」，日本人卻恰好在 1931 年 9 月「來了，及時解救了」被圍困的共產黨人（博伊爾：《中日戰爭時期的通敵內幕》第 41 頁）。王真反駁：「有一種觀點，即把中共的這種發展誣之為『乘機坐大』，這是對中共抗戰歷史的蓄意歪曲。……抗戰給予中共的歷史機遇不是讓其『坐大』，而是使其『戰大』，即通過抗戰來發展壯大，『坐』而不戰，是發展壯大不起來的」（王真：《抗日戰爭與中國的國際地位》第 12 頁）。
- 6 「我有一位在當今中國史學界頗有聲望的朋友就曾向我說過：『沒有西安事變，我不相信那一點點共軍就消滅不了。』」兩廣事變以後，「南方既然安如磐石，蔣氏乃把原先南調、預備解決兩廣的 30 師精銳的中央軍悉數北移，擬對朱、毛部的數千紅軍作其『徹底消滅』之最後一擊。……以中央之 30 師，對紅軍之一小撮，則勝負之數，豈待蒼龜？」（唐德剛：《書緣與人緣》第 88、99 頁）
- 7 一路北伐，鄧寅達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主任，可見當時蔣介石對鄧倚重之深。寧漢分裂，鄧寅達公開反蔣，後被通緝，化裝成工人逃往蘇聯。1930 年，鄧寅達返國，在上海發行《革命行動》，對國共兩黨都有批評，號召組織第三黨。1931 年 11 月 29 日，被從租界引渡，以「危害民國罪」槍斃。陳誠「對蔣介石殺害鄧寅達曾經有過意見，并且害了一場大病」（苑魯、王敏：《史迪威與蔣介石》第 150 頁）。
- 8 日本人先在濟南阻擋國民黨北伐，後在東北炸死張作霖。關東軍咄咄逼人，演化成奉系內部你死我活，民族大義和殺父之仇，逼得愛國少帥沒處躲、沒處藏。
- 9 殷仕：《蔣介石與李宗仁》第 90 頁。
- 10 李宗仁、唐德剛：《李宗仁回憶錄》下冊，第 783 頁。
- 11 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臺灣版，第 96 頁。南懷瑾揭發馮玉祥，「和士兵一起喫飯的時候啃窩窩頭，回去燕窩雞湯燉得好好的，外面穿破棉大衣，裡面卻穿的是最好的貂皮背心」（南懷瑾：《歷史的經驗》第 145 頁）。
- 12 李宗仁認為：「蔣和閻、馮本來勢均力敵，張學良入關，自然舉足輕重。東北軍既佔領平津，閻、馮兩軍鬥志頓失，遂一敗塗地。……張學良受蔣的利誘率其奉軍入關參戰，終以東北防務

空虛而引起9·18事變，東北四省淪陷於旦夕之間。雖滿族的顛預與北洋軍閥的無知，其所招致的外侮也不若蔣氏主政中樞時之甚」（李宗仁、唐德剛：《李宗仁回憶錄》下冊，第472、783頁）。與此同時，用錢、用官策反，確為蔣介石分化瓦解對手的一貫伎倆。譬如寧漢分裂，汪精衛在鄭州會議拉攏馮玉祥共同反蔣。接著，馮玉祥與蔣介石召開徐州會議，蔣介石當場贈送馮玉祥50萬元以犒賞馮軍，並應允南京政府按月撥給馮玉祥250萬元軍餉。從此，馮玉祥調停寧漢合流（姚金果：《陳獨秀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400頁）。譬如中原大戰，「桂系白崇禧有兵五萬人，均係唐生智舊部。當白崇禧擬統率之沿津浦線南下，蔣予唐生智150萬元，囑其收回舊部，旦夕之間白軍盡為唐所有。馮玉祥部集中於河南，可能東取徐州，南窺武漢，蔣策動其部屬韓復榘、石友三叛變，使馮前鋒盡失，只好狼狽走依閻錫山」（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臺灣版，第97頁）。譬如兩廣事件，蔣介石「用金錢收買了空軍將領」，造成連串陣前倒戈，「南天王」陳濟棠狼狽逃避香港（唐德剛：《書緣與人緣》第104~105頁）。

- <sup>13</sup> 林博文：〈江南著《蔣經國傳》香港版序〉。「好在撤退到臺灣後，過去錯綜複雜的派系力量，經過大動亂的淘汰清洗，因禍得福，再無所顧忌內部的傾軋與平衡，蔣先生說了算」（江南：《蔣經國傳》第(3)、264頁）。
- <sup>14</sup> 衛建林：《歷史沒有句號》第211頁。1911~1931年20年時間，封閉割據的四川一省，軍閥混戰478次（李白虹：〈20年來之川閥戰爭〉，吉迪：《內憂外患中的蔣家王朝》第121頁）。
- <sup>15</sup> 「1929年1月國民政府決定裁軍，預定全國軍隊不得超過65師，並特種兵總數不過80萬人，軍費總額不逾全國收入40%」（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臺灣版，第96頁）。「而且蔣氏志在保留自己實力，減縮其他部隊，遂引起各方對蔣氏不滿，爆發為中原大戰」（許倬雲：《萬古江河》第427頁）。
- <sup>16</sup> 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第121頁。
- <sup>17</sup> 史景遷：《追尋現代中國》第610頁。
- <sup>18</sup> 9月18日，日本佔領東北。9月23日，中央政府《告全國軍民書》緊急命令，「全國軍隊對日軍避免衝突，對於國民亦一致誥誡。務須堅持嚴肅鎮靜之態度」（殷仕：《蔣介石與李宗仁》第91頁）。
- <sup>19</sup> 「汪精衛自從1925年孫中山逝世之後，在國民黨內一向不以第二

人自居」（殷仕：《蔣介石與李宗仁》第129頁）。

- <sup>20</sup> 這與共產黨內毛澤東與彭德懷、劉少奇、林彪、周恩來、鄧小平等人先團結奮鬥而後分歧的經歷，頗有些性質上的不同。共產黨的內部鬥爭，多能找到不同觀點傾向和治國方略方面「路線鬥爭」的線索。蔣桂馮閻式的大打出手，內政外交沒有明確分歧，更多權力利益之爭，從來談不上團結奮鬥，自然缺乏妥協基礎（值得參閱殷仕：《蔣介石與李宗仁》；李宗仁、唐德剛：《李宗仁回憶錄》；馮玉祥：《我所知道的蔣介石》）。
- <sup>21</sup> 韓復榘盤踞山東，雖然有關公戰秦瓊的笑談，自號「韓青天」（張鳴：《歷史的壞脾氣》第20頁）。宣佈全面抗戰以後，蔣介石命令韓部死守濟南。韓告左右，「第三集團軍只有五師一旅加幾個民團，總計不過八萬人槍，多是輕武器，尤其沒有重炮。蔣介石有百萬軍，一應裝備俱全，不死守南京，卻要我死守濟南，豈非不公？」隨統軍逃跑（楚雲：《中日戰爭內幕全公開》第334~341頁）。「蔣介石殺了韓復榘，據說劉湘聽到這個消息，被嚇死了」（南懷瑾：《歷史人生縱橫談》第242頁）。
- <sup>22</sup> 李宗仁、唐德剛：《李宗仁回憶錄》下冊，第597頁。
- <sup>23</sup> 羅伯特·達萊克：《羅斯福與美國對外政策1932~1945》第701頁。
- <sup>24</sup> 譬如1936年西安事變半年前的「6·1事變」，「兩廣有什麼把握，能於此時對中央用兵呢？這就因為他們那時估計——也是李宗仁一再向我說的——『中央政令不出五省』！換言之，在兩廣領袖眼光之中，當時的蔣介石，亦不過是國民革命軍北伐前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耳」（唐德剛：《書緣與人緣》第92頁）。
- <sup>25</sup> 「西安事變之圓滿解決，對當時南京政府也提供了『全國統一，一致對外』的抗日戰爭的必要條件，因而提早了全面抗戰。根據當時國民黨『攘外必先安內』的既定政策，沒有西安事變，則國府對日還得繼續『忍辱』，而忍辱有伊於胡底呢？以當年日本侵華的氣焰來推測，南京之抉擇在『抗戰』、在『忍辱』，其結果並無軒輊；所不同的只是：抗戰者『玉碎也』，忍辱者『瓦碎也』，慾求『瓦全』不可得也。如果沒有個西安事變，而國民黨一再忍辱而弄出『瓦碎』的結果，則蔣氏與國民黨在中國歷史上將奚止『身敗名裂』而已哉！所以西安事變對蔣氏、對國民黨，也是塞翁失馬，安知非福」（唐德剛：《書緣與人緣》第90、64~65頁）。
- <sup>26</sup> 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第三篇標題。

- <sup>27</sup> 郭廷如是說（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第136頁）。
- <sup>28</sup> 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第164頁。
- <sup>29</sup> 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第四篇標題為〈「四強之一」及其負擔〉。
- <sup>30</sup> 「羅斯福深知中國的局限性，……在考慮蔣介石擔任在中國、泰國和印度支那的盟軍最高司令官時，他深知蔣介石並不會『得到很大的指揮權』。因為在中國沒有盟軍可以指揮，沒有制定對控制泰國或印支的日軍的作戰計劃，蔣指揮的兵力和管轄的地區仍然像他任最高司令官時一樣。更能說明問題的是，中國並沒有應邀派代表參加參謀長聯合會議。這是徒有虛名，毫無實權的例證。
- 儘管羅斯福瞭解中國的貧弱，並對它在戰後作為國際力量的能力有所警覺，但他仍把一個強大的中國的局面看作一種非常有用的設想。因為有一點理由是，他希望利用中國作為對蘇聯平衡的力量，他想使中國成為戰後世界組織中的四大警察之一，他告訴艾登，因為『在任何同蘇聯的嚴重的政策衝突中，（中國）無疑將站在我們一邊』。他期望這個原則也適用於涉及他們三國的任何佔領和託管」（羅伯特·達萊克：《羅斯福與美國對外政策1932~1945》下冊，第474、557頁）。
- <sup>31</sup> 滿州國理所當然是傳統龍旗，華北臨時政府和華中維新政府是五色旗，汪精衛的國民政府與日本人反復協商，最後確定黃色三角布寫「和平反共救國」六個字，綁在青天白日旗上（陳鵬仁：《汪精衛降日秘檔》）。
- <sup>32</sup> 在中美重新簽訂新約之後，英國、比利時、挪威、加拿大、瑞典、荷蘭在抗戰期間與中國簽訂了平等新約；法國、瑞士、丹麥、葡萄牙在戰後也與中國重新締結了平等新約。「這樣，近代以來列強對華不平等條約體系就基本被打破了」（王真：《抗日戰爭與中國的國際地位》第102頁）。雖然忘了琉球，香港沒能談下來，更沒敢提外蒙古和《尼布楚條約》之後的一百多萬平方公里，現有成就，堪稱是中華民族喜出望外的豐功偉績了。
- <sup>33</sup> 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26國共同宣言發表後，中、英、美、俄四國已成為反侵略之中心，於是我國遂列為四強之一；再自我允任中國戰區最高統帥之後，越南、泰國亦劃入本區內。國家之聲譽及地位，實為有史以來空前未有之提高，甚恐受虛名之害，能不戒懼乎哉」（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臺灣

版，第293頁)。

<sup>34</sup> 蔣中正：《中國之命運》第109頁。

<sup>35</sup> 董顯光：《蔣總統傳》第351頁。

<sup>36</sup> 毛澤東：〈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085~1086頁。

<sup>37</sup> 羅伯特·達萊克：《羅斯福與美國對外政策1932~1945》下冊，第556頁。

<sup>38</sup> 黃仁宇：《放寬歷史的視界》第271頁。

<sup>39</sup> 費正清：《劍橋中華民國史》第2部，第583頁。「丘吉爾對任何僅僅旨在討好蔣介石的『愚蠢』之舉都表示堅決反對」（康拉德·布萊克：《羅斯福傳》第333頁）。

<sup>40</sup> 羅伯特·達萊克：《羅斯福與美國對外政策1932~1945》下冊，第553、556~557頁。1944年「6月底，在為宋美齡所舉辦的一場宴會上，蔣介石公開否認他或他的妻子曾經有過不忠的行為。……在魁北克的八方會議上，丘吉爾和羅斯福決定，除了保持中國名義上的戰爭狀態以外，什麼都不必再多做了。美國人也知道，毛澤東與周恩來比蔣介石具有更強的能力，但是無論是丘吉爾還是羅斯福，都不願意看到中國被共產黨接管，雖然羅斯福曾經希望有機會能與毛澤東面談。而蔣介石，雖然有很多缺點，但是他仍然握有很大的權力。從這個角度來講，西方國家也只能挑選他作為自己在中國的代理人。……斯大林和羅斯福都知道，毛澤東是遠比蔣介石堅定得多的中國民族主義者。地緣政治現實主義輕易戰勝了斯大林的意識形態和羅斯福的理想主義」（康拉德·布萊克：《羅斯福傳》第398、412頁）。

<sup>41</sup> 羅伯特·達萊克：《羅斯福與美國對外政策1932~1945》，第556頁。

<sup>42</sup> 蔣中正：《中國之命運》第182~183頁。表面上神氣活現，實際上心知肚明。美英參謀長聯席會議，連澳大利亞、新西蘭、荷蘭都有份兒。蔣介石作為「四強之一」的戰區司令，多次申請參加，多次遭拒絕；退而求其次，多次申請參加該會議下屬之軍火分配委員會，被人以防洩密為理由，多次遭拒絕。蔣介石私下向美國人抱怨，「余頗自知中國並非強國，今受四國之一之虛名，只有增加我此心之慚愧，而實毫無榮心也」（《中華民國外交史料匯編》第11卷，第5323~5324頁）。

<sup>43</sup> 鄧野：《聯合政府與一黨訓政》第1頁。

- <sup>44</sup> 費正清：《美國與中國》第 321 頁。
- <sup>45</sup> 「在抗戰期間，有一日史迪威被蔣邀晚餐，主人遲到。史在日記裡留下：『蔣介石來遲。他在晚禱。這晚禱不由任何事而中斷。這是一個新的角度。他虔誠與否不說，總之他即鄭重其事。或者他以為與主神交而增強他的直覺』」（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臺灣版，第 145 頁）。
- <sup>46</sup> 宋美齡屢屢自豪地如是說。宋氏一家除國母宋慶齡外，均以美國為歸宿（林博文：《跨世紀第一夫人宋美齡》第 68、347 頁）。
- <sup>47</sup> 七拼八湊的統一指揮，「後面的預備隊可能突然失蹤，側翼的友軍可能不在指定的時間地點出現，部隊的建制不同，補給也有參差，部隊長平日的恩怨也可以影響到戰時的協同」。這種情形下與強敵作戰，「只有經過他的耳提面命，對方才覺得責無旁貸」（黃仁宇：《地北天南敘古今》第 123 頁）。
- <sup>48</sup> 吳十洲：《大浪淘盡》第 123 頁。「重慶上層社會的腐化和有錢階級的自私自肥，卻斲傷了全國艱苦抗日的士氣。1939 年 11 月 11 日《大公報》報道，中國要人寄存香港銀行的賬戶，一億元以上者三人，一千萬元以上者 30 人，一百萬以上者五百人，合計 7.5 億元，僅香港一隅之存戶，足供中國抗戰一年之用。到了 1940 年 10 月，中國私人存入美國銀行竟達 1.7 億美元。在侍從室任職的唐縱於 1944 年 10 月 2 日的日記上寫道：『我國富人存入美國銀行被凍結者，約有 33 億美元，如果移作軍需，尚可繼續抗戰五年有餘。』……1949 年 5 月，宋美齡訪問華府後幾個月，杜魯門總統從銀行界聽說孔宋家族在美國存了 20 億美元，當即下令聯邦調查局調查，調查結果直至 1983 年依《資訊流通法案》公佈時，仍有許多資料遭濃墨遮掩以保密。聯調局認為孔宋家族（包括藹齡、子文、美齡）在美國銀行總共存有 7.5 億美元」（林博文：《跨世紀第一夫人宋美齡》第 146~147 頁）。
- <sup>49</sup> 林博文：《跨世紀第一夫人宋美齡》第 469 頁。
- <sup>50</sup> 「在 1944 年，當情況清楚地表明，蔣介石的戰略是不進行抗日，而且，甚至作為進攻基地的中國有可能丟失時，羅斯福強烈要求蔣介石把所有中國軍隊的指揮權交給史迪威。然而，到這年秋季，由於蔣介石不聽美國的勸導，又由於蘇聯答應幫助抗日從而減少了蔣介石的有效軍事行動的重要性，於是羅斯福不再期望中國人做出重要的軍事貢獻」（黑體加重為筆者所為，羅伯特·達萊克：《羅斯福與美國對外政策 1932~1945》第 761~762 頁）。
- 為此，蔣介石著急呢。1943 年 7 月 21 日，蔣介石召集部屬大

加訓斥：「外人看我們直不當人，非但不當軍人，須知此次勝利於我無與，我軍萎靡已極，抗戰勝利之日，即我們滅亡之時。豫湘戰事失敗下來，我們軍事上在國際上已無地位，此次如不能得到改革，得到回頭……則吾人真無人格、無羞恥。」講話中，蔣介石「聲色俱厲，數數擊案如山響」（鄧野：《聯合政府與一黨訓政》第24頁）。

<sup>51</sup> 譬如，二戰以後「美日安保條約」50年了，「1991年在日美兩國進行的一份輿論調查顯示，有77%的美國人將日本視為美國的對手，只有21%的美國人將日本視為國際夥伴；日本方面對美國的看法也不樂觀，雖然有50%的日本人將美國視為國際夥伴，但將美國視為對手的日本人也高達40%」（日本《朝日新聞》1991年11月18日，李建民：《冷戰後日本的「普通國家化」與中日關係的發展》第162頁）。

<sup>52</sup> 「《大事長編》載有蔣初見羅斯福後謂其有一種超然風度，頗有一見如故之感」（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臺灣版，第348頁）。「蔣在開羅會談期間對蒙巴頓說，「總統不會拒絕我的任何要求，我無論要求什麼事情，他都會照辦。」蔣夫人在會議結束時寫信給羅斯福指出，「蔣委員長希望我再次告訴你，他是多么感激你已經並且正在為中國做的一切事情，當我們今天下午和你告別時，他無法找到頗有意義的話來表達他的情緒和情感，也無法為了你的友誼而向你充分地表示謝意……。就我自己來說，……對於你所做的事情，我的內心充滿著感激之情。」西方人的真實感受，與這般含情脈脈甜膩膩，形成鮮明對照。「蔣介石也對擬議中的作戰計劃不斷地改變主張，在一連串使人摸不著頭腦的程序中，一會兒肯定、一會兒又收回他的贊成意見。蒙巴頓勳爵說，同蔣介石打交道的初次經驗搞得羅斯福、丘吉爾和英美參謀長們『簡直要發瘋』了」（羅伯特·達萊克：《羅斯福與美國對外政策1932~1945》第610、608~609頁）。所以黃仁宇認為，「蔣夫婦在開羅最大之失策尚是在接近羅斯福時。蔣介石見羅斯福時絕對的自信羅對他的處境完全同情，有求必應。蔣夫人宋美齡接待伊利奧時過度的殷勤奉承」（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臺灣版，第348頁）。其實，羅斯福對蔣介石夫婦，從始至終沒有好印象。早在「三叉戟會議期間，蔣夫人不邀而至，而且『令羅斯福惱怒的是，她又和白宮住了下來』，羅斯福的生活因此而被攪亂了。藉助身處白宮的權威地位，她通過電話四處求助於華盛頓的官方機構，並為其丈夫的利益而對人們糾纏不休。……總統的困境在於，他把中國設



想為一個將會領導亞洲擺脫殖民主義統治的大國，但他也意識到，蔣介石不大可能成為中國的領袖。羅斯福也不可能與毛澤東有太多接觸，因為相對於共產黨人而言，他寧願與非共產黨人打交道，而且，與毛澤東的任何聯系都會把蔣介石推入日本人的懷抱。」開羅會議，更熱鬧了。「羅斯福對蔣介石已經不再抱有多少信心了。他曾描述蔣介石是一個『脾氣特別暴躁的人』。羅斯福厭惡蔣介石的『腐敗和低效……以及明顯對廣大中國人民的苦難生活缺乏同情』。但是，儘管感覺到『蔣介石的軍隊戰鬥力十分低下』，羅斯福除了支持蔣介石以外別無他途（每當蔣介石發表講話時，能說一口優雅而流利英語的宋美齡就會從椅子上猛然起身，取代了口譯的工作，來完整地表達『蔣委員長的真實含義』。布魯克認為，聽眾始終不確定他們聽到的到底是蔣介石的意思，還是宋美齡的意思）」（康拉德·布萊克：《羅斯福傳》第343頁）。

<sup>53</sup> 「『中國老百姓好，政府裡的人不好』已成為一般見解（今日仍未消除）」（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臺灣版，第296頁）。

<sup>54</sup> 「比起對日作戰來，蔣介石更感興趣的似乎是節約戰爭資源，準備和毛的共產黨最後攤牌。……史迪威發現了共產黨人的紀律嚴明，作戰勇敢，積極抗日；同時他也看到，由於蔣介石的將軍貪污，士兵喫不上飯，領不到餉；在軍事部署上，蔣介石的軍隊主要是對付共產黨，而不是打日本的。史迪威為改革貪污賄賂盛行的蔣介石獨裁統治而奮力鬥爭，並要求擁有一定的指揮權。這樣，他可以和共產黨一道把一支真正的中國軍隊投入戰場，去抗擊日本人」（普雷斯托維茨：《流氓國家》第253~254頁）。史迪威與蔣介石的根本衝突是，美援的目的是支持中國抗日（當然是為了減輕美國的壓力），得到美援的蔣家嫡系多不在前線，在前線的地方雜牌一觸即潰。最精銳的胡宗南，40萬大軍一直擺在遠離日本人的西北包圍延安。裝備極差，得不到任何美援的共產黨，卻能深入敵後抗戰（苑魯、王敏：《史迪威與蔣介石》第262、295頁）。所以史迪威告誡華盛頓：「美國人被期望繼續為他空運補給物資，以加強一支武裝力量，從而保證中國控制在國民黨手中」（羅伯特·達萊克：《羅斯福與美國對外政策1932~1945》下冊，第549頁）。

<sup>55</sup> 相傳宋慶齡與史迪威關係很好。在如何有效改革的題目上，宋慶齡同情史迪威。有小說家描述，抗戰結束，毛澤東到重慶談判時探訪宋慶齡，宋慶齡甚至抱怨自從史迪威離去，在重慶再沒有知

心朋友（陳景彪、彭錦華：《黑霧紅塵》第130頁）。

<sup>56</sup> 費正清：《美國與中國》第309頁。

<sup>57</sup> 「蔣腐敗的權力機構的組成是基於忠誠而不是效率。史迪威同情廣大的士兵，不信任那些貪污、賄賂的中國官員。史迪威改革和建設一支現代化中國軍隊的努力，遲早會使舊的軍事權力機構崩離析。蔣介石在軍隊中努力維持著中央的權力。……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為了自身的利益，我們的中國政策是用漂亮的允諾、金錢和軍事裝備來鼓動中國人不斷抗擊日本人。這也是羅斯福的天真想法，即幫助戰後的中國，彌補由於戰勝日本而帶來的權力空白——美國人的這一理想從未實現，因為它忽略了中國革命的現狀。如果史迪威改革中國軍隊的想法得以實現，那麼他將創造最終破壞蔣權力機構的軍隊和指揮官，而且無疑會出現某種軍事政變。蔣意識到這種危險。因此，在和有美援撐腰的史迪威打交道時，蔣反對這位狂熱追求戰功、受過戰火磨練的效率專家。蔣主要關心的不是效率，也不是作戰，他反對的是共產主義者一直在進行著的革命」（費正清：《觀察中國》第71頁）。

<sup>58</sup> 「隨著太平洋馬里亞納基地的建成，原計劃用於從中國起飛轟炸日本本土的新式B-29遠程轟炸機開始飛離中國，到1945年1月6日，已全部轉移到了太平洋戰場。從1944年秋天開始，美國軍方正式開始重新考慮反攻日本的戰略。在9月份的魁北克會議上，他們對半年前的將包括臺灣和中國沿海城市作為反攻日本首選基地的計劃避而不談，反而強調盡可能避免代價鉅大的陸地作戰，實施海軍和空軍行動。到了10月上旬，參謀長聯席會議已經明確否決了將中國沿海城市作為反攻日本主要基地的可能性。時任蔣介石參謀長的史迪威在得知美國關於需要在中國沿海建立基地的反復聲明只是為太平洋作戰打掩護時，沮喪地在10月4日的日記中寫道：『這一戰區被取消了，沒有人再要求我們做什麼了。也不會派軍隊來了』」（張振江：《冷戰與熱戰》第34頁）。

<sup>59</sup> 毛澤東：〈論持久戰〉，《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03頁。

<sup>60</sup> 費正清：《美國與中國》第324頁。

<sup>61</sup> 唐德剛：《晚清70年》第3冊，第5頁。

<sup>62</sup> 1948年9月，毛澤東樂觀估計，「我們準備五年左右（從1946年7月算起）根本上打倒國民黨，這是具有可能性的。」算下來應當是到1951年（毛澤東：〈關於遼沈戰役的作戰方針〉，《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334頁）。

<sup>63</sup> 雅爾塔會議決定，作為蘇聯出兵對日作戰的回報，「三個盟國要

維持蘇聯控制下的外蒙古政權現狀；把薩哈林島南部交還給蘇聯；使大連港國際化並保證蘇聯在該港的優越權益；把旅順港租借給蘇聯作為海軍基地；建立中蘇聯合公司，共管中國的中東鐵路和南滿鐵路，這一公司既要保證蘇聯的優越權益，而且又要確保中國的充分主權；割讓千島群島給蘇聯」（羅伯特·達萊克：《羅斯福與美國對外政策 1932~1945》第 734 頁。

<sup>64</sup> 譬如，蔣介石「始終不放棄中央軍校及各分校校長的職位。團長級以上的人員之任命，也經過他親自召見圈定」（黃仁宇：《天南地北敘古今》第 122 頁）。空軍從飛機採購到機構建制、幹部任命，直接由宋美齡親自組織指揮。軍事採購、中央財政和中央銀行從頭到尾都是孔、宋二人輪流經營（林博文：《跨世紀第一夫人宋美齡》）。「蔣宋美齡未參加羅邱會議。但蔣介石以姻兄為外交部長兼個人代表不足，又使乃妻在海外一再介入國際間高層之協定。從各種電文看來既有『文兄』、『三妹』（蔣宋美齡），又牽入『大姊』（孔宋靄齡），甚至孔令侃亦傳遞消息。……外交而又涉及『宮闈』，亦無非國家最高主權不能合理化，其決心又不便公開之表現」（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第 333、342~343 頁）。

<sup>65</sup> 馮玉祥：《我所知道的蔣介石》第 130、108 頁。蔣介石不僅兼任無數校長，而且兼任「四大國家銀行聯合辦事總處的首腦」，按時審閱「四行聯合總處的季度、月度的結算總表」（張紫葛：《在宋美齡身邊的日子》第 250 頁）。

<sup>66</sup> 李宗仁、唐德剛：《李宗仁回憶錄》下冊，第 598 頁。

<sup>67</sup> 「自從談判破裂之後，李宗仁即派出一架專機北上接代表團人員南返，但是國府全體和談代表鑒於李宗仁無法控制當時的政治局面，深恐一回來即遭到黨內保守勢力的危害，所以聽從中共的勸告，繼續留在北平，首開有史以來和談使節投共的先例」（殷仕：《蔣介石與李宗仁》第 225~226 頁）。其實稍微懂點兒人情世故即能斷言，「深恐」云云，不過是找點說辭罷了。

<sup>68</sup> 王泰棟：《陳布雷傳》，徐泳平：《陳布雷先生傳》。

<sup>69</sup> 李宗仁、唐德剛：《李宗仁回憶錄》下冊，第 773 頁。

<sup>70</sup> 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第 417 頁。

<sup>71</sup> 黃仁宇：《地北天南敘古今》第 125 頁。

<sup>72</sup> 國民黨與共產黨在中國現代化歷史進程中殊途同歸，是黃仁宇反復強調的論點，也是他「大歷史觀」的主要論題，或者說是其理論研究的主要入世功能（黃仁宇：《中國大歷史》中第 20~21

章；《近代中國的出路》）。毛澤東當然不以為然，「兩黨的爭論，不是如有些人們所說的不過是一些不必要的，不重要的，或甚至是義氣用事的爭論，而是關係到幾萬萬人民生死問題的原則的爭論」（毛澤東：〈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054頁）。

<sup>73</sup> 黃仁宇：《地北天南話古今》第120~121頁。

<sup>74</sup> 江南：《蔣經國傳》第103頁。

<sup>75</sup> 「社會主義思潮興起於資本主義明顯出現弊病的19世紀中葉，20世紀30~40年代資本主義自由世界面臨失敗危險之際，它的聲勢如日中天。據一些學者統計，各種自稱社會主義的政黨和國家多達上百個」（金觀濤、劉青峰：《毛澤東思想和儒學》第263~264頁）。

<sup>76</sup> 黃仁宇：《地北天南話古今》第223頁。

<sup>77</sup> 李宗仁、唐德剛：《李宗仁回憶錄》下冊，第791頁。

<sup>78</sup> 江南：《蔣經國傳》第167頁。

<sup>79</sup> 衛建林：《歷史沒有句號》第211頁。

<sup>80</sup> 毛澤東：〈丟掉幻想，準備鬥爭〉，《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84頁。

<sup>81</sup> 黃仁宇：《大歷史不會萎縮》第279頁。

<sup>82</sup> 羅伯特·達萊克：《羅斯福與美國對外政策1932~1945》下冊，第554頁。

<sup>83</sup> 黃仁宇對福山的《歷史的終結》不以為然，自己籠而統之，把人類歷史的進化，歸結為從農業為主的道德社會，到商業精神為主宰的大轉變，一貫堅持中國的現代化，只能建立在私有財產為基礎的市場經濟。黃仁宇的這套思想隨處可見，重復多遍，理論層面的典型論述，集中在《資本主義與21世紀》。許倬雲歷來反對社會達爾文主義式的進化論，強調中西文化平行發展，即便近代挨打，也沒有先進落後之分，歌頌中國文化特有的包容胸襟。可是說到國共之爭，卻比黃仁宇更退一步：共產黨利用日寇侵華，從落後農村游擊起家。建國以後「中共數十年，一次又一次的運動，都不外嘗試以農村經驗改造中國！」於是有中國近代三次革命（1911年辛亥革命、1928年國民黨統一中國，1949年共產黨建國），「其間的承襲與延續關係，遠多於劇烈的斷裂。黃仁宇以為蔣介石建立了近代中國的上層結構，毛澤東重建了農村為基礎的下層結構，當可由上述分析覘見其過程。鄧小平的改革，

又將鐘擺擺回到南京時代」（許倬雲：《萬古江河》第445~446頁）。裡外裡，今日大陸比今日臺灣，在向美國學習的進化序列上，落後整整一個輪迴。

<sup>84</sup> 黃仁宇去世後發表回憶錄，對國共兩黨之爭，大篇幅直白描述。和李約瑟一道，黃仁宇堅信中國歷史與西方完全不同，發現社會主義式農村公社具有英國「圈地運動」的功能，也是通向現代化的道路（黃仁宇：《黃河青山》）。遺憾的是，大量發人深省的思考，最終未能突破資本主義是世界各國共同歸宿的窠臼。

<sup>85</sup> 李宗仁、唐德剛：《李宗仁回憶錄》上冊，第395頁。

<sup>86</sup> 黑體加重為筆者所為（史景遷：《追尋現代中國》第713頁）。

<sup>87</sup> 江南：《蔣經國傳》第276頁。

<sup>88</sup> 在福山《歷史的終結》的歡呼聲中，衛建林著《歷史沒有句號》，用大量翔實的材料和資料證明，國際壟斷資本集團推行的全球化，「結果是促使世界更高程度的財富分配的兩極分化。因此，目前的國際環境是社會不斷分崩離析的條件」（衛建林：《歷史沒有句號》緒論扉頁）。